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

郭海娜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 中国·北京 102211

摘要: 延安时期(1935年—1948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特殊历史环境中,以文化建设为重要载体,探索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对此,本文主要围绕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化路径

The Cultural Path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Guo Haina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Special Police Academy, China Beijing 102211

Abstract: The Yan'an period(1935-1948)was a critical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environment of revolutionary bases,the CPC took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path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y and Chinese culture.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cultural path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e Yan'an period,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Yan'an perio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ultural path

0 引言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所处的内外环境既复杂又严峻,其具体表现为外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内部则有教条主义对革命事业形成干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摆脱“外来理论”带来的疏离感,使其真正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凝聚民众力量的思想武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政治、军事实践维度,而是把文化建设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突破口,他们借助理论、宣教、学习三位一体的文化路径,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革命实践需求以及民众认知习惯实现深度结合,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进现实、从干部走向群众,成为塑造革命文化认同、引领革命方向的精神旗帜。

1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路径的历史背景

1.1 民族危机唤醒民族意识与精神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持续侵略,从“九一八事变”起始,到“华北事变”,最终至“七七事变”后全面侵华,国家主权接连丧失,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数千万同胞深陷苦难,这

种深重的民族危机击碎国人原有的麻木与迷茫状态,激发全民族的危机意识与抗争精神。对此,广大民众对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的关心程度大幅提升,迫切渴望一种能凝聚民族力量、指引抗争方向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为大众谋利益的价值导向以及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逐渐被更多人关注。中国共产党身为坚定的抗日主力军,在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斗争时,意识到民族意识觉醒对革命事业有着重大意义。借助创办报刊、开展群众宣传活动以及组织文艺演出等多种途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救亡主题融合起来,采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民众讲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进而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与抗争意志。民族意识觉醒后,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路径筑牢坚实的群众根基,马克思主义不再只是抽象理论,变成和民众切身利益、民族命运紧密关联的行动指南,促使更多人接受且认同马克思主义,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营造出有利环境。

1.2 在文化竞争中重视文化领导权

延安期间中国社会多种文化思潮展开激烈角逐,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文化,企图借文化渗透消磨中国人民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进而奴化民众,而封建复古思潮顽固坚守封建礼教及旧文化秩序,成为社会进步绊脚石,同时国民

党推行官方文化, 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观念, 妄图压制其他进步文化思潮。面对如此复杂的文化竞争态势, 中国共产党若要达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标, 推动革命事业前行, 必须重视文化领导权争夺。党深刻明白文化既是意识形态关键载体, 也是凝聚人心、动员群众重要手段, 倘若无法在文化领域占据主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便难以广泛传播, 革命队伍也难形成统一思想意志。为此,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一场深入的文化建设行动, 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等众多文化教育组织得以成立, 这些组织为革命事业培养起大批文化人才。这些人才深入民间, 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大量反映现实斗争、贴近百姓生活的文艺精品, 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革命理念。不仅如此, 中国共产党还主动参与思想理论交锋, 批判各类错误文化思潮, 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性与革命特质, 逐步在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权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并积极争取文化领导权,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路径的开辟扫清思想障碍, 让马克思主义在多元复杂的文化生态中稳固扎根、茁壮成长, 最终成为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的核心精神动力。

1.3 革命实践需求推动理论本土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实践过程中遭遇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维护等不少挑战, 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引。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时存在教条主义问题, 一些革命者直接套用经典理论和苏俄经验, 没考虑中国实际情况, 结果让革命遭受挫折。随着实践推进, 党慢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 才能发挥作用, 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建设时面对经济封锁开展大生产运动, 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并结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 统战性质政权建设方面, 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政治现实加以结合, 协调好阶级利益、保障民主权利。这些实际需求促使党进行反思总结, 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 把理论和实践相融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成果。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基层开展调研, 撰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 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与方法。最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路径正式确立, 而革命实践的迫切需求正是这一进程的强大动力。

2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

2.1 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

延安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研究为基础, 有

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通过搭建研究平台、聚焦中国问题以及融合中国文化等方式, 构建起了理论框架。在研究平台建设方面, 党对延安的理论资源进行整合, 成立一批专门机构, 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研究体系。延安马列学院是 1938 年成立的核心研究阵地, 其下设的中国问题研究室、哲学研究室等部门, 从不同学科维度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院校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作为重点, 聚集艾思奇、何干之等理论工作者。这些机构既承担着研究任务, 又负责培养理论人才, 最终形成了“研究—教学—实践”的良性循环。延安时期的理论工作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道路等关键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 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 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其中《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领导力量等内容进行了系统阐述, 并且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观点, 为中国革命指引了方向。而艾思奇所著的《大众哲学》, 则是运用通俗的语言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把抽象的理论与生活中的案例相结合, 比如通过“鸡蛋孵小鸡”的例子来解释“内因与外因的关系”, 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能够指导民众的工具。

2.2 组织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宣教

理论研究的成果需借助有效的文化宣教传递给民众,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考量根据地民众的文化水平与认知习惯, 跳出传统宣教单一模式的局限, 打造出“文字 + 文艺 + 人际”多维度且立体化的文化宣教体系,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民众容易理解且愿意接受的文化形式, 推动马克思主义完成从“理论殿堂”到“民众生活”的传播跨越。作为文化宣教的基础形式, 文字宣教的开展依托党创办报刊、出版书籍以及编写教材等举措, 这些举措共同搭建起广泛的传播网络, 其中《解放日报》《新中华报》等报刊是核心阵地, 《解放日报》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社论, 内容聚焦批判教条主义与宣传“实事求是”, 同时还和其他报刊一起开设“通俗讲话”“群众来信”等栏目, 助力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理解“减租减息”等政策与理论。文艺宣教属于创新亮点范畴, 党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革命理想及政策融入戏剧、音乐、美术等不同形式, 以此达成“以文化人、以艺载道”的目标。《白毛女》依托喜儿的故事揭露封建压迫, 同时宣传“阶级斗争”“农民解放”相关理念, 《黄河大合唱》

用激昂旋律把“团结奋斗”精神和民族抗争精神融合在一起,版画、年画作品像《减租会》《生产自给》这类则依靠简洁画面开展政策宣传,这些作品能够突破语言文字带来的限制,进而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人际宣教是文艺宣教之外的重要补充手段,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冬学”“夜校”,让教师结合生产生活实际情况,借助“工”“农”“革命”等汉字向民众传递革命思想,这种方式能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互动性,促使民众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提升理论传播的实际效果。

2.3 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习活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培育革命新人”当作目标,构建起了一个常态化学习体系,该体系覆盖了党员干部以及普通民众。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员干部,建立起严格的学习制度。194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制定学习计划并建立学习小组。中央党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为核心课程,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当作教材。同时,在学习内容设计方面,相关人员编写《工农读本》《抗日三字经》等通俗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民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当下的革命形势紧密联系起来。而在学习形式选择上,依托“冬学”“夜校”“识字班”等基层阵地,结合日常生产作息安排各类学习活动,比如“冬学”会利用农闲时段,教师采用“讲故事”“唱山歌”等方式开展教学,“识字班”则将汉字学习和马克思主义词汇讲解结合在一起推进。与此同时,根据地借助“墙报”“黑板报”等载体,定期更新理论知识、政策内容以及新闻信息,确保民众能够随时接触到相关理论内容。通过这些举措,延安时期的常态化学习体系,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掌握”,为革命事业培育出大批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骨干力量,还为党的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思想保障。

2.4 大力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创作

中国共产党将文化创作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载体,构建出既有理论深度、又具群众温度的传播路径。首先,在创作方向上始终围绕“为群众服务”展开,明确文化创作要立足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传统文化基因相融合,避免采用脱离现实的教条化表达方式。其次,在创作形式方面注重选用群众喜爱的载体。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挖掘秧歌、民歌、话剧、

连环画等通俗形式进行创作,就比如说《黄河大合唱》以民族音乐旋律为基础,融入抗日救国的革命情怀,借助艺术力量让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深入人心。此外,在内容创作方面聚焦现实需求,一方面对理论著作进行通俗化阐释,例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用生活化案例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打破理论垄断局面;另一方面围绕抗战、土地改革等核心任务创作作品,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通过文学叙事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农村变革中的实践成效,把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筑牢文化根基。此外,民间说书也得以创新,新书深受百姓喜爱。通过文艺下乡,延安文艺工作者不仅创作出“群众”的文艺、“人民”的文艺,还实现文艺领域的大众化转向,让文艺作品从少数精英的殿堂走进广大民众的生活之中。

3 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探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路径,以理论研究作为根基,以文化宣教当作载体,以学习活动作为保障,构建起“理论—传播—接受”的完整文化链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众的深度融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时期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这一时期的文化实践,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同时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凝聚了全党的思想共识以及民众的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文化与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李清扬,梁纯雪.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探索及成就[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25,39(04):8-14.
- [2] 杨秋霞.延安时期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与经验研究[J].文教资料,2024,(13):34-37.
- [3] 刘圣兰,刘星.延安时期艾思奇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与启示[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3,(03):65-72+168.
- [4] 王一凡.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与启示[J].中国军转民,2022,(16):85-86.
- [5] 李清扬,欧阳光明.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J].苏区研究,2022,(03):68-80.

作者简介:郭海娜(1976.10-),女,汉族,北京市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